

翻译社会研究新发展

——Sela-Sheffy 的惯习观探索

唐 芳

(香港理工大学, 香港)

摘 要: 从社会学视角进行的翻译研究始于上世纪 90 年代, 现已发展成为当今翻译研究的主要方向之一。本文着重介绍 Sela-Sheffy 的社会学翻译研究观, 通过回顾她对译者策略多样性、翻译场域动态建构性以及译者行为模式独特性所作的分析, 展示在 Bourdieu 和 Simeoni 之后, 社会学视角为翻译研究带来的新启示。

关键词: 翻译研究社会学视角; 译者惯习; 翻译规范; 翻译场域; 翻译行业

中图分类号: H0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7242(2012)05-0082-05

1. 前言

20 世纪后半叶, 解构主义日益盛行, 该派的主要观点——语言符号所表达的意义不在符号本身, 而是由该符号与其他符号的差异关系生成的——日益被学界接受。至此, 意义的确定性被消解, 传统的翻译忠实观也被打破, 学者们相继跳出对原文与译文等值问题的研究。80 年代末翻译研究迎来了文化转向, 学者们将目光从源语文本转向了目标语文本, 视后者为目标语文化的建构实体, 将研究目的设定为通过描述翻译现象来探寻翻译活动的规律。到了 90 年代后期, 场域 (field)、惯习 (habitus)、资本 (capital)、幻象 (illusion) 等社会学概念被引入翻译研究, 为翻译学科带来了全新的社会学视角, 翻译活动被重新定义成行为 (主要是译者) 为获取资本、争夺显赫地位而进行的一场激烈竞争, 这一定义使翻译活动的社会属性得到了突显, 使译者在译文生产过程中的主观能动性倍受重视。

以色列著名文化研究学者 Rekefet Sela-Sheffy (2005: 2) 认为翻译是一种社会活动, 译者的行为并非单纯的文本处理, 其组织形式与行为准则都受到社会力量的制约, 然而, 译者行为在受到限制的同时也存在一定的灵活性, 这是由他们的文化身份和在特定行为场域中的相对位置决定的。近年来她的研究兴趣集中在译者群体为构建职业身份并提升社会地位而采取的策略方面。从 2006 至 2009 年, 她收集了大量资料, 包括上世纪 80 年代早期到 2004 年间公开发表的数百篇对以色列译员的专访和报道、向以色列译员和在校研究生发放的调查问卷、译者发布于网络的信息以及以色列译者联盟 (The Israel Translators

Association, ITA) 的相关统计数据等, 基于此形成了对以色列译者现状比较充分的了解。Sela-Sheffy (ibid.: 1-20) 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展开了对翻译规范与译者惯习的探讨: 1) 译者策略的多样性; 2) 翻译场域的动态建构性; 3) 译者行为模式的特殊性。她的研究目的是揭示译者如何在惯习的影响下构建职业身份, 提升社会地位。

2. 译者策略的多样性

2.1 理论根源——规范与惯习的互动性

早在 60 年代, Levý (1967) 就提出: 翻译活动的特点在于它始终是一个“做决策的过程”, 无论在翻译的哪个阶段, 大到原文文本的选择, 小到具体的遣词造句, 译者必须从众多选项中作出选择, 但译者的选择并非杂乱无章, 而是遵循着一定规律。这段论述是对翻译规范作出的最早阐释。随后 Toury (1980: 51) 将这种规律提升至理论层面, 提出了“规范” (norms) 概念——某特定社群共有的普遍价值观或思想体现, 包括对正确与错误、充分与不足的认识, 以及在特定场合哪种具体的行为指示 (performance instruction) 是适宜的。

然而在现实中译者作出有违规范的行为也屡见不鲜, 为解释这些现象, 学者们借用了社会学的“惯习” (habitus) 概念。迄今为止, 对惯习作出最系统阐述的是法国社会学家 Bourdieu (1990), 他将惯习定义成一套“定势系统” (system of dispositions), 这一系统反映出人在成长、家庭教育、学校学习、工作、交际等社会化过程中逐渐学习、内化并强化了的社会规律。此外他还强调惯习具有即兴生成性 (improvisational) 特征, 是一种既稳定又可变的力, 既能限制个人的倾向与偏好, 又能容许由场域变化或是行为人在特定文化领域地

位的变化所带来的转变与持续构建。(ibid.)这就从理论上为译者策略的可变性提供了可能。

从定义上看,规范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性约束,而惯习则强调了个体主体性与社会客观性之间的相互渗透,是介于社会结构与个体感知、行动之间的转换机制,是社会属性被个体内化后形成的认知属性。Simeoni(1998:33)将两者的关系概括为没有惯习使之具体化的规范与没有规范的惯习一样没有意义,这充分体现了两者的相互依存性,也是两者进行互动的基础。

笔者认为规范与惯习的关系依规范的存在形式发生变化。具体说来,规范的存在形式有三种:1)未被行为内化;一旦社会上大多数人都不再接受某种规范,它便会逐渐失去生命力,退出历史舞台;2)已被行为内化且成为其“第二本性”(second nature),即惯习,这种规范以“自我施压”的形式作用于行为人;3)已被行为内化了,但还未被行为完全吸收,以“外来压力”的形式存在,对于这种规范,行为人可能采取两种态度:遵从或背离。

以第一种形式存在的规范存活时间短且不对行为人造成影响(只有被内化了的规范才可能作用于行为人),因此我们不将其纳入讨论范围。需要注意的是以第二种形式存在的规范(即惯习)的外在表现形式也是遵从(这种遵从是无意识的,然而第三种情况下的遵从是有意识的),因此,在对规范与惯习互动关系的讨论中,我们将重点放在对规范的遵从与背离上。

2.2 译者的遵从与背离

正如 Even-Zohar(1997:373-374)所言,在翻译活动中,译者可以是保守型的也可以是创新型的,即使是在同一历史时期,不同译者也可能作出不同选择。译者策略受到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市场、翻译场域的内部运作规律及译者之间的竞争等多种因素影响。比如,从场域中所处的(或期望达到的)位置来看:通常行业中的资深人士会成为资本持有者,一旦其地位受到威胁,他们便会增强行业中的主导势力,而行业内的新人资本占有量小,因而常常以革新为策略。当然,相反的情况也可能发生:当对创新的追求成为主流,保守主义就可以成为处于边缘位置的行为人脱颖而出的有效途径。

Sela-Sheffy(2005:5)建议在谈及译者定势时,必须考察译者所在的具体时空环境,不能想当然地认为他们在文化生产中发挥的作用永远是次要

的、他们秉持的态度永远是被动的。例如,英美文化对世界的影响巨大,属于主导文化,相比之下,阿拉伯、以色列、中国文化的影响力较弱,属于边缘文化,处于主流文化内部的译者倾向于遵从本土文化,而处于边缘文化或新生文化中的译者却并不都选择“遵从”。正如 Toury(2002:155)所发现的那样,当译入语文化中长期缺失主导性标准时,当革新的理念受到大力推崇时,翻译常常成为为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引入新文化模式的有效途径。

此外,在如何正确对待“遵从”和“背离”的态度方面,Sela-Sheffy(2005:6)认为应该避免一种偏激的观点,即将一切受社会制约的行为都视为被动的、消极的,将译者的“遵从”归入消极范畴,认为规范是负面的、是应该克服的缺陷,对规范的遵从是不称职的表现。这种观点一直受到艺术和文学批评界一些学者的大力推崇,他们宣称艺术和文学创作应彰显个人风格,绝不应该趋于标准化,但翻译活动毕竟不同于文学和艺术,并非纯粹的创作,而且背离规范、推陈出新、个人独创也是在受到同等社会制约的条件下发生的。

2.3 译者的屈从

在对译者惯习的研究中,Simeoni(1998:7)似乎走向了极端。他强调译者的“屈从”,认为这是由翻译行业在文化领域中长期所处的卑微地位所决定的。此外,译者作为两种甚至两种以上文化和语言之间的传播媒介,需要协调多方利益,面临的压力自然更大,这也加剧了他们的屈从性。综合以上两点原因,他将“屈从”视为一种亘古不变、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译者惯习。

笔者认为,Simeoni(ibid.)对译者“屈从”的刻画虽符合大众对译者的普遍印象,却漠视了译者的选择权与支配权,将译者行为囚禁于一种刻板的静态行为模型中,这是对“规范独裁”(tyranny of norms)的片面理解。且从理论层面来看,一成不变的译者屈从显然与 Bourdieu 将惯习概念扎根于以权力争斗为中心的动态场域中这一态度背道而驰。

Sela-Sheffy(2005:4)进一步指出这种观点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1)译者并非在所有文化圈中一直处于从属地位;2)屈从定势并不适用于行业中的所有个体。从一些实证研究中我们不难找出例子:清末民初时,中国现代文学还处于“萌芽”状态,我国作家自己创作的现代意义上的小说还没有出现,于是翻译文学成了满足当时新兴市民阶

层文化需求的最主要来源,以林纾为代表的一批著名翻译家顺应时代的潮流翻译了大量西方小说,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当时的文学界,他们在当时的文化圈中绝非处于从属地位。又如 Simeoni (2007: 195-200)在对第一位将 Shakespeare 的《凯撒大帝》(*Julius Caesar*)译成意大利语的译者 Domenico Valentini 的个案分析中认为,他的在当时看来实属非标准化(abnormative)的译本也证明了“屈从”并非是对所有译者的真实描述。

3. 翻译场域的动态建构性

3.1 翻译行业现状

作为一种职业,翻译行业的组织性不强,缺乏统一的职业准则、正规的培训体系和法律约束。译者群体常常被视为一个隐形的、辅助性的、无明确定义的准职业化组织。至今人们还普遍存在着一种误解:无论年龄大小、资历深浅,只要懂两种语言就能做翻译。Sela-Sheffy(2006: 245)对以色列译者联盟的调查发现,这个自愿入会的组织既无权制定行业规范和译者薪资标准也无能为力为译者调配工作。虽然会员人数逐年上升,仍有大量译者(特别是资深的文学翻译家)没有入会。中国的情况也相差无几:虽然翻译专业在高等院校竞相推出,人事部的翻译资格考试也致力于规范行业准入标准,但译者的薪资水平高低不一,译者之间的交流甚少,行业内部仍缺乏组织性。

3.2 翻译场域的自治

Sela-Sheffy(2005: 11)认为如果“场域”是一个具有层级位置的空间,场域内人们受某种特定激励机制的驱使对位置进行争夺,那么以色列译者的翻译活动就构成了独特的行为场域。该场域受到内部竞争及分级机制调控,有独立的职业精神和译者形象。场域内还分布着不同群系派别,如文学译者群、字幕译者群等。译者的资历有深浅之分,声望有高低之分,立场有保守与革新之分,翻译的材料也有高雅与低俗、重要与琐碎之分。译者之间的权力斗争对内构建了场域内部分级机制,对外影响着翻译场域在文化界的地位。

从译者公开发表的言论来看,以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为起点,以色列文学译者一直致力于提升行业的自治能力,希望借此树立他们的职业形象,改善他们的社会地位与工作条件(Sela-Sheffy 2006: 243)。这场运动的先锋来自文学翻译领域,这是因为文学译者比非文学译者享有更高的媒体曝光率,以个体形式赢得象征资本的可能性也更大。文学译者积极参与各项社会活动,如颁奖仪

式和媒体报道等。一场只属于文学译者的“造星运动”(star system)(Shumway 1997: 85-100)似乎在以色列爆发。Sela-Sheffy(2005: 12)对此的解释是:文学译者常要面对拮据的经济生活和艰苦的工作环境,赢取个人荣誉似乎成了他们摆脱窘境的唯一出路。

中国的情况似乎有所不同,争取行业自治的各种行动中,非文学译者的力量不可小觑。无论是专业化翻译课程的逐年递增、准入资格考试的日趋成熟还是研讨会和网络讨论等交流活动的日益频繁,都是为了加强职业意识和行业凝聚力,通过提高行业准入门槛以确保“专业化”程度,这其中非文学翻译方面的主动性还是非常明显的。与文学译者不同的是非文学译者们的努力一般不强调个体,而是旨在提高译者作为一个整体的“群体权威性”。

透过对同行的关注、与同行的较量、对资本的夺取、对地位的占有,译者构建起 Bourdieu(1985: 15)所谓的“有限生产场域”(field of restricted production)。不管是坚持保守还是倡导革新,译者掌握着自己对翻译文本类型的选择权和对“大众偏好”的漠然甚至鄙视态度。虽然根据 Janis (1996: 352-356)的调查,译者行业在文化界的地位仍显卑微,人们在承认译者精通双语、知识广博的同时仍将译者视为原文作者的侍从,译者的社会地位与教师、编辑、图书管理员不相上下,但越来越多的译者正通过树立独特的个人风格,彰显其在行业中的无可取代性来提高薪资待遇,改善工作环境。比如文学翻译界的大师们把翻译当成一种事业而非谋生手段,他们将翻译能力刻画成一种独特的定势思维,一种无法解释的天赋,称翻译能力并非通过系统学习就能习得,真正的翻译绝非一门处理文字的技术活;又如在口译界,现在的译员越来越重视“用户教育”,他们拒绝在没有隔间(booth)的环境中进行同传,要求主办方在会前提供足够的会议资料,要求确保工作过程中能看到会场及发言人的一举一动,这些都是译员们为提高行业自治做出的努力。

虽然 Simeoni(1998: 26)对于翻译场域的存在仍持保留态度,认为所谓的“翻译场域”组织松散,译者根深蒂固的屈从性也决定了建构过程中较强的他律性,如若认为已存在一个由译者构成的独特“群体”,实属过于乐观,但仍有不少学者坚信翻译场域的存在,Gouanvic(2005)就尝试着勾勒出法国的美国科幻小说翻译场域,Hanna(2005: 181-

188)也对埃及的戏剧翻译场域进行了描绘。

其实正如多元系统理论中的“系统”一样,场域这一概念也是一种抽象的存在,是学者们为了更好地描绘某些特定范围内行为人的行为模式而作出的尝试,再加上不同的文化环境中翻译的地位各不相同,翻译行业的发展状况存在差异,笔者认为不应该像 Simeoni(1998)那样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应该效仿 Sela-Sheffy(2006,2008),对特定时空内的翻译活动进行实地考察,用数据来证明翻译场域的存在与否。

4. 译者行为模式的多样性与独特性

Sela-Sheffy(2005:7)提出研究者不应将注意力都集中到“规范独裁”上,认为对规范的内化程度越深,译者能力就越强,因其否定了“规范背离”可能带来的积极影响,研究的重心应该放在对“某些规范的影响”(sway of certain norms)上,更多地关注译者个体或某译者群体的独特惯习,如在不同场合他(们)面临着哪些新的选择,影响翻译活动的因素是因何故、在何时及何种程度上对译者发挥着作用。

秉承“规范独裁”之观念的学者(如 Simeoni 1998)认为因受地位卑微和资本不足的制约,译者必须通过展现其对规范的彻底屈从才能在行业中获得认可,这无疑是一种片面的观点。Sela-Sheffy(2008: 613-614)沿着新的思路,揭开了以色列译者行业更为复杂的真实情况,展示了译者个体行为模式的多样性与独特性:

首先,对传统希伯来语文体和表述方式的遵从是通常的译者行为,但并非所有译者都遵循这一传统。虽然对某些以色列文学译者而言,熟练掌握传统且高雅的希伯来语是入行的基本要求,但其他译者只将其视为选项之一,称其为一种宝贵财富而非强加的压迫。表现之一:在非文学翻译领域,比如技术说明书、商业合同、字幕翻译等领域,就存在无视希伯来语规范、大量吸收流行英语词汇的趋势。这些实用文体译者通常不是文学译者,两者所服务的机构及客户也各不相同,从这种意义上说,文学翻译与实用文体翻译是不同的两种翻译活动。表现之二:即使是在文学翻译领域,依然有某些译者群体不仅不遵循希伯来语传统,甚至认为这种传统已过时,主张通过翻译活动大量引入外来文化。这类译者或是在其他文化中成长起来的,或是多年久居国外,他们不愿做传统文化的“守门人”而希望将自己塑造成“世界文化”的传播大使,希望开启本国或本民族的文化之门,

通过吸收外来的词汇与表达方式避免狭隘主义或僵化现象。

其次,还有一些译者视遵从规范为一种主动策略而非被动承受。表现之一:一些牢固掌握希伯来语的以色列资深译者视自己为语言文化传统的守护者,其译作以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为目标读者,他们否认自己是规范的奴隶,而将自己视为规范的制定者、文化的创造者。为了巩固优势地位,高居文化中心的他们划定了“专家”与“非专家”之间的界限,阻止新手译者踏入他们的圣殿。表现之二:一些新手译者也会在翻译中展现他们对传统且高雅的古希伯来语的使用能力。但是同样的行为,对于新手译者而言却变成了一种改革创新。因为在他们所处的时代,大部分译者都倾向于使用现代希伯来语,对古希伯来语文体的精通实属罕见,因此,新一代的年轻译者一旦掌握这种超凡脱俗的能力就足以让自己从同辈中脱颖而出。

资深译者和初入门译者的生活背景和期望不同,在翻译行业中占据的位置也不同,这就决定了他们在行动时各自的动机与受到的局限亦不同,但相同的行为方式向我们揭示了一种有趣的现象:同一行为模式可能源于完全不同的——甚至相互矛盾的——文化定势。

以上对以色列译者的调查结果不仅向我们展示了译者选择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更描绘出某些个体译者或部分群体译者行为模式的独特性。这就提醒我们,在研究“译者惯习”时,有必要细化翻译所在的特定场域(如是文学翻译场域还是戏剧翻译场域),综合考虑译者策略的可变性及其赢取象征资本方式的多样性(保守或革新)。

5. 译者惯习研究

5.1 译者惯习的范畴

在实际操作中,对“译者惯习”的研究常常局限于译者在进行翻译工作时使用的特殊技能与偏好。但 Toury(1995:242)曾指出译者的翻译能力是在一个更广阔的社会化过程中形成的,这表明在翻译能力的形成过程中,译者养成的惯习里有一部分是与经济条件、教育背景相似的更大型的社会团体所共有的而并非是译者独有的。

其实不仅翻译能力的习得取决于更广阔的社会因素(教育背景、生活环境等),翻译能力本身也并不能成为评判译者成功与否的唯一参数。Sela-Sheffy(2005:15)认为“场域惯习”在理想情况下指行为人在生活的各个方面具有的一系列倾向性和

偏好,因此要想成为“翻译人才”,单凭对两种语言的掌握是远远不够的。

无论是译者自己还是翻译场域中的其他参与者(如出版社、读者)都会对译者存有某种期望,这种期望既有翻译能力方面的,也有个人观点、性格与生活习惯方面的,包括对某种文化现象的评价、对知识的渴求程度、职业荣誉感、社会关系网及守时程度等,这些期望最终将勾勒出译者惯习的范畴,描绘出一幅译者的肖像画。

5.2 译者评价标记

由于成长过程中的每一次经历都可能成为惯习的塑造过程,惯习研究有必要对研究对象的整个社会生活轨迹展开彻底调查。但这种研究涉及的变量过多,实际操作性并不强。Peterson(1997:72)认为比追踪译者生活经历更重要的是考察他们对这些经历的评价与态度,他鼓励从个体译者的评价标记(evaluation markers)中总结出译者惯习。开放式问卷和采访都是有效途径,由此得来的资料既能反映“译者的真实形象”,还有助于描绘出他们理想中的职业形象。

限于相关记录材料的有限性,目前从社会轨迹研究惯习的研究尚不多见。Sela-Sheffy(2005:16-18)进行了尝试,她通过问卷记录了译者对工作语言、期望受教育的形式和内容、职业兴趣及薪酬等参数的评价标记并就此展开讨论。下面是她的一些调查结果。

从工作语言上看,英语与希伯来语是主要的工作语言,所有接受问卷调查的译者都懂英语,这表明英语是以色列的第二语言。事实上阿拉伯语和俄语是以色列的另外两大语言,奇怪的是掌握这两大语言的以色列人选择不从事翻译工作或不公开自己的翻译身份,这体现了对外语的掌握也是一种财富象征,是译者用来塑造文化身份的工具。

从对理想课程的选择上看,大部分译者倾向于进修人文类而非技术类课程,这暗示着他们更希望将自己塑造成知识广博的通才而非技术行家型的专才。

从薪酬水平上看,译者普遍认为自己薪酬过低,这既反映出他们认为受到了不公正待遇,付出的心力远超出获得的报酬,也暗示了他们凌驾于“无知”客户和公众之上的自我优越感。

从自我评价上看,以色列译者认为自己求知欲强、兴趣广泛,崇尚见多识广、精益求精、尽职尽责而非职业或物质上的成功,强调对翻译事业的

热爱是他们选择这份职业以及在行业中脱颖而出的原因。他们常将生活与工作交织在一起,从事翻译工作并非由于这项工作与其学识背景相匹配,而是受与生俱来的某种神秘力量驱使。

在惯习研究中,收集到的材料无论多少,都只能是对真实情况的部分反映,但译者的评价标记能避免研究者作出不合理或不真实的猜想,帮助研究者追踪引导译者作决定的社会限制条件,从而提高对惯习的回溯能力。

6. 结论

虽然惯习只是一个具有启发性的抽象概念,不能从中推出具体的、可操作的假设(Sela-Sheffy 2005:3),而且将某种惯习直接与某种行为相联系可能被打上“机械决定论”的烙印,然而社会活动的驱动力主要源自对地位、对文化资本的争夺,惯习概念正凸显了这种本质,能对诸如译者策略的多样性、翻译场域的动态构建以及译者独特的行为模式等问题作出解释,弥补翻译规范研究的不足。惯习和场域的概念拓宽了描述翻译研究的视域,提高了对译者主观能动性的重视,笔者相信相关研究将会催生出更具启发性的研究成果,推动翻译研究特别是描述性翻译研究不断向前发展。

参考文献:

- [1] Bourdieu, P. 1985. The market of symbolic goods [J]. *Poetics* 14:13-44.
- [2] Bourdieu, P. 1990. Codification [C]// M. Adamson, (tr.) *Other Words: Essays towards a Reflexive Sociology*. Cambridge: Polity Press:76-86.
- [3] Bourdieu, P. 1993. *Sociology in Question* [M]. R. Nice, (tr.) London: Polity Press.
- [4] Even-Zohar, I. 1997. The making of culture repertoire and the role of transfer [J]. *Target* 9(2):373-381.
- [5] Gouanvic, J. 2005. A Bourdieusian theory of translation, or the coincidence of practical instances [J]. *The Translator* 11(2):147-166.
- [6] Hanna, S. 2005. Hamlet lives happily ever after in Arabic. The genesis of the field of drama translation in Egypt [J]. *The Translator* (11):181-188.
- [7] Janis, Marja. 1996. What translators of plays think about their work [J]. *Target* 8(2):341-364.
- [8] Levý, J. 1967. Translation as a decision process [C]// *To Honor Roman Jakobson: Essays on the Occasion of His Seventieth Birthday, 11 October 1966* (vol. 2). The Hague & Paris: Mouton: 1171-1182.
- [9] Peterson, R. 1997. Changing representation of status through taste displays: An introduction [J]. *Poetics* 25: 71-73. (下转第 91 页)

片中中学到教训,然后向前看。主人公普莱尔作为作者的代言人,与“历史的天使”抗争,迎来了“进步的天使”,他相信人类总会在历史车轮的转动中不断前行。为了使观众和读者从模棱两可的麻木与混沌状态中清醒过来,该剧将“乌托邦”与“反乌托邦”两极同时呈现,试图通过鲜明的对比唤醒这个保守、妥协的社会,推动大众抗争“历史的天使”、拥抱“进步的天使”。

5. 小结

戏剧《天使在美国》充分利用《圣经》中众多的意象,并对其进行解构、重构,甚至颠覆原有的喻指意义,从而赋予文本以深刻的寓意和丰富的内涵。与《圣经》文本的互动不仅为该剧增加了亦真亦幻的色彩,更为新文本意义的生成提供了一种独特的手段。艾滋病患者普莱尔与《圣经》中先知的互文映照,体现了剧作者对边缘与中心、身份与权力的颠覆与重构;剧中雅各与天使搏斗故事的意义重构既体现了主人公思想的积极力量,又能让读者更好地理解剧中人物的矛盾心理状态;上帝的不在场彻底颠覆了《圣经》中上帝的权威,暗示了作者对里根政府以及当代美国社会混沌状态的不满与积极改变现状的呼吁;而“历史的天使”和“进步的天使”之转换则真实地反映了剧作者进步的政治观。但所有这些意义的产生只有将其置于互文性的视野中才能实现,也只有借助于观众与读者积极参与文本意义重构才能使该剧得到意义上的升华。

参考文献:

[1] Allen, G. 2000. *Intertextuality* [M]. London & New

(上接第 86 页)

[10] Sela-Sheffy, R. 2005. How to be a (recognized) translator: Rethinking habitus, norms, and the field of translation [J]. *Target* 17(1):1-26.

[11] Sela-Sheffy, R. 2006. The pursuit of symbolic capital by a semi-professional group: The case of literary translators in Israel [C] // M. Wolf. *Übersetzen-Translating-Traduire: Towards a "Social Turn"?* Muster, Hamburg, Berlin, Wien, London: LIT:243-262.

[12] Sela-Sheffy, R. 2008. The translators' personae: Marketing translatorial images in Israel as pursuit of capital [J]. *Meta* 53(3):609-622.

[13] Shumway, D. 1997. The star system in literary studies [J]. *PMLA* 12(1):85-100.

[14] Simeoni, D. 1998. The pivotal status of the translator's habitus [J]. *Target* 10:1-39.

York: Routledge.

[2] Barthes, Roland. 1977. *Image-Music-Text* [M]. Trans. Stephen Heath, London: Fontana.

[3] Benjamin, W. 1973. Theses on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C] // H. Arendt. (ed.) Harry Zohn. (trans.) *Illuminations*. New York: Fontana Press: 132-156.

[4] Fisher, James. 2008. *Understanding Tony Kushner* [M]. Columbia, SC: The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5] Harris, J. E. 1994. Miracle on 48th street [J]. *Christopher Street* (210): 5-8.

[6] Kristeva, J. 1986. Word, dialogue and novel [C] // Toril Moi. *The Kristeva Reade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34-61.

[7] Kushner, Tony. 2003. *Angels in America—A Gay Fantasia on National Themes* [M]. New York: Theatre Communications Group, Inc.

[8] Savran, D. 1995. The theatre of the fabulous [C] // Per K. Brask. *Essays on Kushner's Angels*. Winnipeg: Blizzard Publishing: 95-117.

[9] Weber, Carl. 1998. I always go back to Brecht [C] // Robert Vorlicky. *Tony Kushner in Conversation*. Ann Arbor, MI: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05-124.

[10] 萨莫瓦约,蒂费娜. 2003. 互文性研究[M]. 邵炜译.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11] 赵宁. 2004. 先知书·启示文化解读[M]. 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

收稿日期:2011-11-11

作者简介:陈爱敏,教授。研究方向:英美文学。冯瑶,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英美文学。

(责任编辑:李建波)

[15] Simeoni, D. 2007. Between sociology and history. Method in context and in practice [C] // M. Wolf & A. Fukari. *Constructing a Sociology of Translation*. Amsterdam: Benjamins: 187-204.

[16] Toury, G. 1980. *In Search of a Theory of Translation* [M]. Tel Aviv: Tel Aviv University.

[17] Toury, G. 1995. *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Beyond* [M]. Amsterdam &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18] Toury, G. 2002. Translation as a means of planning and the planning of translation: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and an exemplary case [C] // S. Paker. *Translations: (Re) shaping of Literature and Culture*. Istanbul: Bogazici University Press.

收稿日期:2011-11-10

作者简介:唐芳,博士生。研究方向:翻译研究,口译研究。

(责任编辑:杨淑华)